

張鐵君著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義主際國與義主族民

著 君 鐵 張



80740953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拾日
收到

行印社版出書圖民國

月一年十三國民華中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目次

一、民族問題解決的基點就是民族至上

1. 民族問題的提出及其解決的基點……………一
2. 共產主義者對民族革命認識的錯誤……………四
3. 統一團結成了一時的戰略……………六

二、民族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

4. 弱小民族有其自己的獨立陣線……………一〇
5. 中山先生以民族觀點來看階級戰爭……………一二
6. 何以民族革命爲世界革命的主流……………一四

7. 無產階級革命應根據民族革命來解釋……………一六

三、爲民族獨立解放而保護祖國

8. 共產主義者保護祖國的觀點……………二二
9. 無產階級之所以願保衛他們的祖國……………二四

四、國內少數民族的自決自治

10. 一律平等與自由分立……………二八
11. 中國民族政策與蘇聯民族政策的差異……………三〇
12. 中國歷代民族政策批判的批判……………三五
13. 中山先生民族政策精義……………三八

五、中華民族原來就是一個民族

14. 中華民族內在分立或統一的問題……………四一
15. 漢苗同源論的實地研究……………四三
16. 國內各族的文化交流……………五二

六、民族道德的本質和形式

17. 恩格斯與杜林的論爭……………五四
18. 中山先生的道德觀……………五六
19. 階級性的道德……………五九

七、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20. 真正肩負抗日與統一的黨是國民黨……………六二
21. 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的理論與實際……………六九
22. 統一團結的基本原理……………七四

吳城古蹟與國粹論

八、結論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一、民族問題解決的基點就是民族至上

民族問題的提出

民族主義是解決中華民族問題更進而解決世界被壓迫民族問題

及其解決的基點

的一種主義，但針對着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提出的民族問題應分為

以下幾個問題來解決：

(1) 民族革命是否祇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2) 民族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究竟孰為世界革命的主流？

(3) 對於保護祖國的觀念的，是爲了某一階級的生存利益？抑爲了整個民族的獨立生存？

立生存？

(4) 民族自決的精義，對外當然爲獨立自主，但對於國內少數民族應否解釋爲

(4) 自由的獨立權或分立權？

(5) 中華民族是否本來即為一個民族？

(6) 由恢復民族自信力的運動而提起的固有道德問題，應當怎樣解釋？

(7) 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統一的方式要根據何種原理，才算正確？

我他現在來談民族主義，似不應再作皮毛的膚淺的研究，應該更深入的進一步來考察以上諸問題了。對於以上諸問題的解決，三民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所依以解決的基礎是大有差別的，這差別的基本觀點是什麼？我們以為就是『民族至上』。前者主張民族至上，所以要以民族主義達到國際主義，後者因站在國際立場，所以要以國際主義涵蓋民族主義。兩者的基點不同，於是由基點演繹而來的民族問題上的一切論點，都顯出很大的分歧了。

三民主義對於國際主義，向來未曾忽視。中山先生說的世界主義，就是一種國際主義。固然，這種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者的國際主義內容不同，一是縱的民族組織，一是

極的階級組織，一是民族本位，一是階級本位，但中山先生究竟是以國際主義爲終極的目的。依中山先生的意見，國際主義要通過民族主義才能達到。尤其是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國際主義，如不通過民族主義就妄想達到國際主義，那是一種最危險的思想。

中山先生說：

『因爲有了世界主義的思想，所以滿清入關，全國就亡。』因爲那時候，中國大多數人很提倡世界主義，不講民族主義，無論什麼人來做中國皇帝，都是歡迎的。『如果民族主義不能存在，到世界主義發達之後，我們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以爲民族主義不合潮流，這個論調如果是發自英國美國，或發自我們的祖宗，那是很適當的，但是發自現在的中國人，這就不適當了。』

不過中山先生反對講世界主義，祇是反對在民族革命進行期間來高調世界主義，到了各弱小民族革命完成以後，中山先生却並不反對。中山先生說：

我們『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

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強權打破以後，世界上沒有野心家，到了那世界，我們便可以講世界主義。」

可是 中山先生並未反對世界主義，他的意見，是祇有通過民族主義來講世界主義，才沒有危險，因為我們要撥己及人，並不是捨己從人的。這便是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民族問題上差異的基點。三民主義主張民族至上，以民族主義為主，國際主義為屬；共產主義主張階級至上，以國際主義為主，民族主義為屬。兩者的出發點既不相同，所以從出發點展開出的一切理論也就大不相同了。

共產主義者對民

族

革命理論的錯誤

共產主義者對於民族主義的革命，常認為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這便是由上邊的基點分析來的。列寧在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上說道：

「每一民族主義的運動，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因為在落後的國家中之大部份的人是農民，而農民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之代表。」

列寧的觀點和一切共產主義者一樣，他們都把歐洲社會進化的歷程，由封建——資本再到社會主義的社會，認爲是一條天經地義的公律。對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社會進化歷程，他們以爲新歐洲先進國家的社會進化必然一致。所以中國共產主義者將這種進化歷程的觀點，竟機械的應用於中國社會發展的歷程上。他們以爲殖民地國家社會進化的現階段既是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社會，凡是這些國家的革命，一定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了。這種機械的，公式的觀點，和中山先生迴顧越上的經驗大有區別，因中山先生是基於『人定勝天』的創造觀點的。歐洲某些國家的革命固然先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才可希望達到無產階級革命階段；但殖民地國家是否也要經過這兩個階段呢？中山先生是早已加以否認。中山先生說：

『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視屬地爲末節，即可證明其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環視歐美，彼且望塵莫及也。』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是以民生主義、民權主義爲前提，解決民族問題，同時對於

民生民權兩問題也一併進行解決。所以中國的民族革命如果基於三民主義的原則，便必然不會成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共產主義者把中國或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革命，看爲祇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因而他們——

「要把被壓迫階級的利益從普遍全國民衆的利益的概念分拆出來。」（第三國際二次大會議決案）

這種觀點，對於中國或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革命是最有害的。在民族革命的過程中，各階級應有「存則俱存，亡則俱亡」的信心。分別無產階級利益與全民族的利益，這是一種離心的觀念，祇有帝國主義者對於被壓迫民族內發生此種離心的觀念才特別歡迎。

統一團結祇成

了一時的戰略

共產主義者看重階級的利益，看重民族革命中階級的性質，其結果，所謂統一團結在民族革命過程中，自然不過成了他們一時的戰略。

列寧在同一演說中說道：

「共產國際在落後的國家中，應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暫時的合作，或合作，但是決不能

與他們混合，而要保存無產階級之獨立性，雖然無產階級運動或尚在萌芽的形式。」

這就是中國共產主義者所主張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本質。他是以階級為單位而希望別的黨派統一起來，這統一也祇是在一時的戰略上才有其需要，並且在這暫時的協作，也還有許多條件。斯大林在東方大學的學生會議席上說道：

「對於埃及或中國這一類國家，共產黨應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政黨聯合，揭破本國資產階級的半途不前的和不徹底的性質，而與帝國主義堅決奮鬥，就是這種聯合的責任。這種兩重性的政黨，如果他牽掣共產黨的手足，不妨害共產黨煽動和宣傳的自由，不阻撓無產階級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而又使共產黨這方面便於作事實上領導革命運動的事，那末，這種政黨是需要的。假如他不能保證所有這種種的條件，那末，這種兩重性的政黨，就用不着，而且也不合宜。」

依據這樣的條件來團結，其動機完全在於利用而非出以精誠，這樣的團結是不堅固的。第三國際固然自有其立場，但在民族主義者看來，這樣的戰略不但有害於弱小民族

的反帝革命，即於國際主義也無裨益。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既是民族至上主義，他統一至民族，並不以階級為統一的單位。中山先生對於民族內部的團結統一稱為「小羣」，「大羣」的基礎是宗族的團體。中山先生為什麼不以階級而以宗族團體為統一的基礎呢？因為中國既是次殖民地的國家，工業落後，一般的祇有大貧小貧的階級（非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中國尚無顯明的分野。中山先生說：

「我們可以利用的小基礎，就是宗族團體，此外，就是宗親羣體。」

共產主義者立在國際主義而不立在民族主義的立場解決民族問題，他們不但注重階級的單位，而且他們並不問殖民地的國家中，究竟有沒有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分野縱尚未顯然形成，他們也要以階級意識來參加民族革命的。總之在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說

「這些落後的國家之特點，就是在他們中這是資本主義前的關係統治一切，而絕對

沒有純粹無產階級運動的可能。在這些國家之中，差不多沒有工業的無產階級，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在這些國家之中，拿了並且應當拿着指導者的地位。」

這仍然是以民族主義歸於國際主義的觀點。

列寧對於民族自決的協助問題，也曾主張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中，『社會主義者應當盡量協助維持這些國家中資產階級民主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最革命分子，幫助他們以暴動或革命的革命的手段，以反對壓迫他們的那些帝國主義國家。』可是幫助的目的對於無產階級的政權仍念念不忘。羅易說：

『殖民革命之第一步，為推翻外來的勢力，但是最重要而且必要的責任，是建設民主之共產主義的組織，使他們能夠隨手建設蘇維埃共和國。』

『我們幫助殖民地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並不是要滅亡舊的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的傾向，而是開闢殖民地的無產階級之一條解放的道路。』

他們的真意，仍以為民族革命的成功，既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功，民族革命成

功後，還帶來一次無產階級革命。這和中山先生將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舉其功於一役的觀點，當然大異其趣。

二、民族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

◇ 小民族有其

◇ 己的獨立陣綫

◇ 殖民或次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

命，原是各有其使命的。現在的問題是：民族革命為世界革命的

◇ 主流？抑無產階級革命為世界革命的主流呢？民族革命為無產階級

革命總問題的一部份？抑無產階級革命為民族革命總問題的一部份呢？共產主義者的答覆和三民主義者便不相同。前者的主張是無產階級革命，後者的主張却是被壓迫民族革命。

斯大林在「民族自決」一文中說道：

「西歐革命之勝利，一定要與殖民地及被壓迫民族之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相聯合

，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之一部份，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之一部份。』『在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中，所有革命的可能性已經消失了沒有？倘未消失，是否有無希望利用這些可能性為無產階級革命，把殖民地與一切被壓迫的國家，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預備軍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預備軍，為無產階級的同盟。』

依共產主義者的意見，弱小民族祇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方所爭取的預備軍。一個弱小民族是反動的民族抑是革命的民族，全看他是否反對帝國主義或依附帝國主義為斷。牠祇能在兩大階級的鬥爭中，選擇一個立場，弱小民族自身却沒有自己的立場可言。牠祇能為世界勞資兩階級中的一個階級犧牲或為其利用，牠却不能為自己的解放而犧牲或利用世界勞資兩階級之一，依他們說，無產階級革命是主體，是革命的總問題，弱小民族，是總問題的一份，若部份與總體相矛盾時，就應該拋棄這個部份。不過這裏却發生了一個問題，在中國和日本的苦戰過程中，中國既需要無產階級祖國的蘇聯協助，同時也需要資本主義的國家如美國等幫忙，若拋棄了中國自己的立場看，現階段的中國究

這是一階級的預備軍嗎？蘇聯的呢？抑英美的呢？難道中華民族及落後的一切弱小民族，除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大陣線之外，不能樹立一個弱小民族的陣線嗎？一個求解放的弱小民族，外交關係何等複雜，決不能單純在勞資兩階級國家間和屬於某一階級的國家發生關係，而拋棄了其他。以無產階級的蘇聯，尙可與法西斯國家的德國成立協定，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原來就被世界各帝國主義勢力交織之網所束縛，在解放運動的過程中，怎樣可以不顧一切，祇和屬於某一個階級的國家發生關係，問題豈有如此單純？

中山先生以民族

點來看階級戰爭

中山先生對於民族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孰爲主流的問題，我們從他演講中所用的術語看來，他完全站在民族革命爲主體的立場。在中山先生眼光中的世界革命，顯然他沒有用無產階級革

命的觀點來分析，他對於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分割，仍是以民族革命爲觀點。他說：

『世界上十萬萬人之中，頂強盛的是歐洲和美洲的四萬萬白種人，白種以此爲本位去看待別種人種。』『但是俄國革命成功，他們一萬萬五千萬人，脫離了白種，不贊

成白人的侵略行爲，現在正想加入亞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強暴的民族，那末，強暴的民族，只剩得二萬萬五千萬人，還是想用野蠻手段，拿武力去征服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故此，世界人類，要分兩方面去決鬥，一方面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方面是三萬萬五千萬人。」

中山先生分割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係以強暴民族和弱小民族的觀點，未嘗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術語。且俄國的反抗資本主義國家侵略，與亞洲民族攜手，中山先生用的是「加入」兩字，「加入」的意義，即是以亞洲的弱小民族革命爲主體，加入蘇俄的無產階級革命，他是以民族革命爲主流去包涵無產階級革命。俄國革命在中山先生眼光中，不過是革命的白種人，脫離了殘暴的白種人，他並沒有以階級的眼光來看俄國。甚至於他對階級鬥爭，也是以民族鬥爭的眼光來觀察。中山先生說：

「國際間大戰是免不了的，但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且種分開來戰，黃種與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

這一觀點，非常重要，我們萬不可忽略。中山先生爲什麼要將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戰爭，看爲是白種與白種，黃種與黃種的戰爭呢？這一點中山先生包含有極深刻的意義。這就是證明中山先生認爲世界革命應該以民族革命爲主流，民族革命應該包含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祇是民族革命總問題的一部份罷了。

何以民族革命爲

三民主義以民族革命爲世界革命的主流，共產主義以無產階

世界革命的主流

級革命爲世界革命的總體。要判斷這兩種主張孰爲正確，我們應

該判斷弱小民族或無產階級在現階段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總體系中，誰是世界被壓迫者的最下層基石。倘這問題先行解決，孰爲主流的問題也就隨而解決了。

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自發展成爲帝國主義以後，她的養料，最大部份並不是她們自己無產階級的血肉，大半是從殖民地弱小民族吸吮而來的。爲着保衛資本主義的存在，必須要有寬大的剝削的來源，這來源就是從殖民地取得的額外利潤。對殖民地弱小民族的

剝削，比之對歐洲各先進國自己無產階級的剝削所遭遇的抵抗自然較少，以剝削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天然財富與人力勞動的利潤，來改良無產階級的待遇，使本國的階級鬥爭得到緩和，同時輸入殖民地的廉價貨品，以減低無產階級的生活費用，這是保護資本主義的一條妙計。所以歐洲先進國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不但必需需要積極的鬥爭，反可以得到暫時的妥協，由資產階級血腥的贓物中，尚可分得一杯羹以自利。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現階段，先進國的無產階級固屬資產階級的墊腳石，但殖民地後進國的弱小民族，早成爲先進國勞資兩階級的墊腳石了。我們如果不忽略現階段的經濟事實，如果要推翻資本主義的制度，促進工業國家的勞資階級鬥爭，除了殖民地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加速進行起來，斷絕先進國資產階級從殖民地所榨取的額外利潤，絕對不能達到目的。所以民族革命實在是促成先進國家社會革命的一個基本動力。即使不從上述的經濟觀點出發，而從人口的比率與其所佔地理面積的廣袤觀點出發，其結論也可一致。

這一事實馬克斯也已看到，在他的「中國及歐洲革命」一文中，也已說過「歐洲人

民的未來是自由與政府的經濟的未來通著；其係於現在所經歷於此天朝帝國者，將遠勝於現存之任何其他政治原因。一個馬克斯因為隱於資本主義的前期，仍未能清楚的看出民族革命的基本大。到了列甫雖然觀察馬克斯深入，承認這事實，不過因立場不同，他站在歐洲無產階級的地位，所以仍不能看到民族革命為世界革命的主流，仍不了解無產階級革命，祇有在民族革命的總問題中才有其意義。

無產階級革命應根

假使我們承認無產階級革命是民族革命總問題的一部份，那末，無產階級革命勢不能不根據民族革命以求解釋。

據民族革命來解釋

中山先生要將十二萬五千萬人組織起來，其中就是以弱小民族為生加入俄國的二萬萬五千萬的白種人，意思是弱小民族沒有得到解放以前，無產階級絕對不能得到真正解放的。

俄國關於民族自決的問題，以為必須分為三種形式的國家來解決，這原是可以說得通的，但他站在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立場，所以他的理論更有高產的餘地了。

例如西歐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美利堅的國家，列甫主張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不能像資產階級用些抽象的口吻來贊成民族平等，應當要求各殖民地 and 被壓迫民族在政治上得自由分立。在主觀的要求原則上，這固然很對，可是在客觀的事實上實不過是一種國際主義的幻想。當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尚能和資產階級分享剝削弱小民族額外利潤的時候，無產階級爲了他自己階級利益，如何能夠對贊助弱小民族而不用抽象口吻呢？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認爲次殖民地弱小民族國家抵抗侵略的鬥爭中，應當以這些被吞併在侵略國家內的弱小民族爲主要動力，去促進侵略國家的無產階級迅速舉行革命，然後侵略國家的無產階級始能真正贊助弱小民族的革命。因已被吞併的弱小民族之積極要求解放是必然的，侵略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需此種動力的推動，才能引起階級革命。已被兼併的民族如希臘、朝鮮、琉球的弱小民族，應當以各種可能的方法，積極去促進其帝國主義國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因侵略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鬥爭，是極有利於弱小民族革命的。若不以侵略國家內已被吞併的弱小民族爲主體，去促進所在地的侵略國內

的階級鬥爭，則無產階級革命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俄國革命的成功，並不能證明以無產階級為主力的成功，祇能證明俄國內民族問題得到解決才成功的。

中山先生對於階級鬥爭的反對，他祇限於在被壓迫民族的內部，在侵略國的國家中，他曾經說過，「或者要採用馬克斯的辦法」。如上所述，這種以侵略國家內的階級鬥爭為手段，來達到被壓迫民族解放的目的，中山先生却不反對。

以上是工業先進的國家（第一種形式的國家）適用的原則。至於第二種形式工業落後的國家，經濟結構尙停留於半封建的階段，階級分野尙未顯明，如中國埃及這一類的國家，雖然是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仍未淪於殖民地地的命運。在這些國家中，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者的意見，便絕對相反了。共產主義以無產階級革命為主體，過去他們幫助殖民地民族革命，是為無產階級的解放開闢道路。列甯說：

「我們共產主義者幫助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僅僅當這種運動是真正革命的，且運動的代表者不阻礙我們組織農民和被壓迫羣衆的時候，倘若沒有這種條件，我們

共產主義者便應當奮鬥。」

他們幫助的目的，列甯也以爲：

「是欲使落後的國家之將來無產階級政黨的分子，在自己特別責任意識上，有所團結，有所訓練。這一特別責任，是在本民族中與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奮鬥。」

這當然是將殖民地民族革命，化爲附庸併入他們共產國際的營壘裏，以民族革命爲主流的三民主義的建立者。孫中山先生，是不承認此種觀點的。我們一讀他和越飛共同發表的宣言便可證明。中山先生逝世後，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宣言的指示，以致於釀成多年的內戰，減弱了反抗日帝國主義的人力、物力、財力，這種血的教訓，似不應再忘記了！

現在日本侵略中國愈爲猛烈，同時對於蘇美的威脅亦日愈加甚，我國與蘇聯爲世界革命的兩大柱石，如第三國際檢討過去的政策，糾正以往的錯誤，蘇聯對我的援助不再循此種利用弱小民族爲國際主義犧牲的路線，生死合作，禍福與共，則中蘇兩國，必皆

爾有裨益。 中山先生說：

「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由此便知世界主義實藏在民族主義之內。」

次殖民地國家在驅逐帝國主義勢力過程中，依照三民主義，同時便要實行民生主義的建設，階級問題便逐漸和平的解決了。蘇俄的二月革命後還要來一次十月革命的老文章，三民主義者決不許再去抄襲。

三民主義的目的，第一步是要建造一個三民主義的民族國家，這種國家，中山先生說是最新式的。既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共和國，中華民族在求得獨立解放以後，他還要負援助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的責任，由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再進一步去促進歐洲無產階級的解放，然而這樣的責任，必須自己是一個最新式的民族國家，否則便不能得各弱小民族的信任。這一切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三民主義者必須迅速使這些國家內階級的矛盾逐漸消滅，絕對不再使其日趨分化，致使反動

國主義的力量，因內部鬥爭而銷耗以盡。

第三種形式的國家如印度這一類的國家，資本主義已經相當發展，多少已有了本國的無產階級，如果依據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原則，也不應專以無產階級爲主體，應當積極發展各階級中前進分子的民族意識，將他們團結在民族主義者的周圍，向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者奮鬥。至於這些國家內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當然也應予以相對的承認，因這些國家的階級鬥爭，事實上也可以打擊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所殖的勢力。三民主義的反對階級鬥爭，祇在工業落後的尙未受病的國家，因爲這些國家祇要防病於未然，如在已受病的國家，中山先生也許容納馬克斯那種病理學的方法。

總之，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流，民族革命的完成，是完成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和條件，要解放作帝國主義墊腳石的無產階級，便不能不先解決這還在墊腳石下的最低階級的弱小民族，這最低階級的基礎不動搖，那座資本主義寶塔的石腳，決不會崩潰。

所以，無產階級革命實在祇是民族革命總問題的一部份。

三、爲民族獨立解放而保護祖國

◇ 共產主義者保

三民主義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既主張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所以

◇ 護祖國的觀點

對於保護祖國觀念也和共產主義不同。三民主義是爲全民族的獨立解

◇ 放而保衛祖國，共產主義却爲無產階級革命開闢道路而保衛祖國，這種區別是很大的。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說過這麼一句話：

「共產主義者謀欲廢止祖國與國民性，這是非難我們的話，勞動者沒有祖國，我們不能夠從他們取去他們所沒有的東西。」

這句話所引起的誤會與非難確是不少。共產主義發展到列甯，一切馬克斯的不甚顯明的語句，列甯多能給他一個確定的解釋。馬克斯這句「勞動者無祖國」的話，列甯也給了牠一個限制，依列甯的見解，共產主義者，並不是一般地反對保衛祖國，祇是要根據每一戰爭的具體歷史的特質而決定。如果那戰爭的具體歷史的特質是一種反動的，使

略的以及爲分割殖民地而起的戰爭，無產階級便應當反對保衛他們的祖國，以免爲資產階級所利用。假使這戰爭的特質是革命的，進步的以及弱小民族爲抵抗侵略而起的自衛戰爭，無產階級就應當爲保衛他的祖國而犧牲了，這就是中共參加中國抗日戰爭的唯一根據。所以有人說共產主義者不主張保衛祖國，這當然是一種誤解，然而說共產黨之所以保衛祖國和三民主義者沒有什麼不同，似乎又太淺見了。

共產主義者之保衛祖國，他們完全是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他們是爲全民族內的某一階級——即無產階級在弱小民族被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中，如果不保護弱小民族國家這一暖室，若果這暖室被帝國主義的狂風暴雨衝破，不但資產階級的莠草要遭受損害，即暖室內無產階級的玫瑰的蓓蕾也要消滅。所以作爲暖室看的祖國，不能不努力加以保衛，暖室得到保衛，莠草與玫瑰雖一同成長起來，但那時再來一次剷草工作，這暖室便可以爲玫瑰所獨佔了。

三民主義者對於他們的主張所懷疑的是：暖室內的資產階級的莠草爲什麼要等待牠

成長起來後才再來剷除？爲什麼不於抵抗狂風暴雨的帝國主義侵略時，就同時設法使之不再蔓延而爲害呢？燧室中除了無產階級的玫瑰以外，其他的千紅萬紫的階級，爲什麼不同時減少她們彼此間的鬥爭而使她們萬莖齊放呢？

三民主義之所以要保衛祖國，牠的目的是爲了整個民族。他以爲中華民族內不僅是階級而且還有少數民族，不僅階級的分野要在牠雛形的時候衝之泯滅，即國內民族的界限也要迅速使之融化。這些工作，便是建國工作之一，既然抗戰同時要建國，這種工作當然同時進行。因此三民主義者，便不僅是爲了無產階級而保衛祖國，純然是爲了祖國內的一切階級和一切民族，泯滅這些階級和民族的界限，絕對不需要再來一次階級鬥爭或國內的民族戰爭的。

無產階級之所以
要保衛他們祖國

民族主義的目的，除了中華民族自求解放外，還要援助世界被壓迫民族也一律得到解放。中山先生說：

「現在歐風東漸，安南被法國滅了，緬甸被英國滅了，高麗

國家，各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的保障。便可多增加一層。兩者雖同一目的要完成世界革命，但三民主義者認為被壓迫民族是侵略國家勞資兩階級的墊腳石，要完成無產階級革命，必先努力被壓迫民族革命。當侵略國的無產階級大多數還正分享資產階級從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吸吮的血液時，如不將他們的墊腳石動搖，則他們國內階級鬥爭的社會革命絕對難於爆發。因此，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流，在次殖民地弱小民族國家保衛祖國的運動中，共產主義者便應迅速的放棄他們在這些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而匯合於這世界革命主流的民族革命。這就所謂部份與全體矛盾，勢不能不顧及全體。

在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保衛祖國這一口號，當然是常被資產階級利用來掩飾他們分割殖民地的戰爭和侵略行動。要將資產階級這利用保衛祖國的面具揭穿，列甯主張侵略國家中的無產階級應當起來加以反對。這種主張的效力如何，前次大戰中所表現的事實，已經證明是一種幻想了。列甯對於階級意識與民族意識兩者效力孰大的問題，他的估量不甚確切。在一個世界的戰爭中，階級意識一遇民族意識就必然粉碎，一遇到

外戰爭，階級意識必然為民族意識所克服。前一次的歐戰中，各國的無產階級都各為其祖國和他們同志相見於疆場，那時共產主義者的階級意識，早已等於烏托邦主義者的「人道」，也不過是一種希望而已。

為什麼階級意識總敵不過民族意識，為什麼帝國主義分割殖民地的戰爭，大多數的無產階級仍願效命，這是有極深刻的意義的。這就是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的侵略戰爭的勝利中，大多數的無產階級仍然可以分享戰勝的利益。所以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不起來，侵略國家內的勞資階級鬥爭，可以因侵略所獲的利益而得到調和。保衛祖國，恰成了侵略國家內勞資兩階級都有利的口號了，德意的最近事實亦可證明。在這樣的情態下，列寧還想侵略國家中的無產階級起來反對保衛他們的祖國，這是忽略了民族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真實基礎的。

二十世紀的革命主流是民族革命，要揭破侵略國家利用「保衛祖國」的面具，與其希望和資產階級利益均沾的無產階級，不如希望被他們吞併了的弱小民族；與其死用階

級意識，不如活用民族意識。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尚有額外利潤流入侵略的國家時，大多數無產階級對於他們的祖國，似乎尚有希望。假使共產主義者要去策動大日爾曼族國家的無產階級來反對他們的祖國，那是怎樣的一種結果是不難知道的。我們如果把眼光轉到這些侵略國家吞併的捷克民族，阿比西利亞民族以及朝鮮民族，要他們起來反對；那可說是易如反掌。當優勝國家無產階級的脚步，正踢在弱小民族的肩上，要叫他們去反對有利可得的祖國，那當然是不可能了。

四、國內少數民族的自決自治

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主張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一律平等之自由與自由。」又說：「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

民國。』

民族自決權，自威爾遜提出以後，一切弱小民族，無不以此為運動的目的。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實即在求民族的自決，中華民族對外要求自由平等，自然對於境內各民族應該要一律平等。但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所主張的少數民族自決權，是在統一或聯合的原則下的平等權，此種平等權是要在整個的中華民族獲得獨立解放以後，各少數民族的平等才能達到。所以民族自決權的解釋要因具體的歷史事實的時空性而不同。對於侵略國家的關係而言，弱小民族的自決權，應解釋為獨立權或分立權，如中國就應要求獨立，印度便應要求分立。對於被侵略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爲了集中力量以抵抗帝國主義，自決權應解釋爲在聯合統一原則下的平等權而非自由分立權。一個民族對外如果要求獨立解放，對內便必須要求聯合統一，這是一個重要的論點。共產主義者對於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完全從分立權的觀點來闡發，那是非常錯誤。（俞希平的民族革命論一書，更是分立權的觀點。）因他們以共產國際的立場爲立

焉，把外蒙古與回疆化爲獨立自主的小國，以便成爲蘇聯的衛星，成爲蘇聯對日帝國主義者的屏障，這種種毒藥對於中國是很危險的。

◆中國民族政策與蘇

◆中華民族內的少數民族要怎樣才能使他而密切的統一聯合呢

◆聯民族政策的差異

◆其國主義者以爲要使他們統一起來，必先要承認這些少數民族

俄國的民族政策的成功來論證的。何三民主義者認爲中國民族問題的性質和蘇聯大不相同。蘇聯是以自治自決解釋爲自由分立權，而以自由分立權爲達到統一的目的的手段，中國恰相反，是以整個民族的自治自決或獨立解放爲目的而以各少數民族間統一或聯合爲達到此目的的手段。兩國民族問題性質之所以這樣懸殊，當然由於兩國的客觀環境。要將蘇聯以分立求統一的辯證性的民族政策移植中國，首先要看中國有無下列的三個條件：

第一、境內的少數民族要無外力的誘引，他們要求分立，是出於自發，而且要受國

民族問題的極大意義

第二、這種要求，要在沒有對外作神聖的民族戰爭的時期。

第三、要各民族勞動者有一種強烈的階級意識，在縱的分立的各民族間，另實有一橫的階級性的聯繫。

這三個條件在中國是否具備了呢？誰也不能以肯定來答覆吧！我們知道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他們並未要求分立權，縱有要求也絕對不是出於自發而多由於外力的誘引。如日本之於偽滿內蒙，帝俄之於外蒙回疆都是如此。蘇聯境內的少數民族，這種引誘的外力，雖未必全無，然比之中國的外力極為微弱是毫無疑義。

帝俄時代，大俄羅斯民族常以沙皇的專制權威壓迫境內的弱小民族，俄國革命前便已匯着分立的趨勢。中國的漢族對於滿蒙回藏苗彝很少有尼古剎那樣的壓迫方式。而且俄國少數民族分立的外在背景，決不像次殖民地中國這樣複雜。他們要求自治自決，分立組織自己的國家，完全因受沙皇的壓迫而出於自發。這要求如果不加以承認，感

難取得其信仰，所以列寧要以承認他們的分立權來達到俄國的統一，這種戰略確得了相反相成的妙用。故列寧說：

『一個國家所規定的離婚權，不會使一對和睦的夫妻向法院聲請離異。』

這一原則在俄國非常適用，若在中國却會得到相反的結果。因中國這個家庭，夫婦雖然和睦，不幸外面却來了許多的誘引，且家庭中的分子文化水準甚低，容易受外力的欺騙。這種離婚權的承認，如不在肅清這些外來的惡勢力以後，這個家庭便要立刻扯散了。中國少數民族與俄國少數民族的最大差異點，就是中國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的要求主要的是外因，俄國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的要求，主要的是內因。俄國戰前是列強之一，現在也是強國，國內未受各帝國主義的支配。中國是弱國，國內就存在着許多國際的勢力。俄國革命前是半工業化的國家，經濟的機構已可以泯滅弱小民族的對立，中國是封建社會的國家，最易成分裂的割據。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不對症下藥竟機械的移植俄國的民族政策，這當然是另有立場的。

其次，以分立求統一，要在平時或在國內的戰爭時或者可以說得過去。俄國戰爭，在俄國布爾雪維克黨執政前後是國內階級性的戰爭，是弱小民族反抗沙皇及資產階級政權的戰爭，承認各民族的分立權，反可以得到極堅固的統一。中國的戰爭是對外反帝國主義的戰爭，是各階級各民族聯合一致對外的戰爭，大家要求的是統一或聯合不是分立。在對外戰爭中來提倡分立權，這不過幫帝國主義者來打擊革命勢力罷了。

還有一點，中國和蘇聯大不相同，蘇聯是以縱的民族的分立為形式，骨子裏仍然以橫的階級意識的聯繫為內容。所以列寧承認民族分立權，事實上是以分立為形式貫以統一的內容。在中國既沒有強烈的階級意識，若果在抗戰中承認各少數民族的分立權，又無階級意識的聯繫貫通其間，中華民族便瓦解了。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因為他們站在共產國際的觀點，所以不能不為外蒙古的獨立自主作辯護。爲了辯護此種國際主義的路綫，他們遂以民族自決權爲口實來大肆宣傳。

由以上的分析，足見蘇聯是以民族自決的分立權爲手段來達到統一，我們是要先求

得國內的團結。去和帝國主義奮鬥以爭取中華民族的自治自治。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以「獨立求統一」的口號，正如他們的「以民主求統一」的口號一樣，都是無的放矢。老實說，中國少數民族之患，非患於不分立，正患於分立。恰如中國人民的個人行動非患於不自由，反患於太自由。中國的沙皇式的專制，在歷史上是確有的。為中國少數民族要求分立，恰如中山先生痛斥的為中國人民要求自由的不諳事實一樣，難道少數民族的少數民族還不是分立的嗎？

其實承認中國境內的民族的自治自決權，是三民主義者革命的目的。可是自治自決權不平等是分立權，相反的，在中國是要於統一中求自治，於聯合中求自決，中國少數民族要求的祇是平等權不是分立權，難道要求平等權便一定非經過分立的階段不可嗎？這種自治自決權，在帝國主義勢力未掃除前，三民主義者，主要要經過一個扶植的階段。

中山先生說：

「對於各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治自決。」

爲什麼要加以扶植呢？就是要將中央的向心的勢力建錘起來，將離心的帝國主義的勢力驅逐出去，各少數民族不再受外力的誘引，那末少數民族的自決自治，才沒有流弊。所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白的宣佈各少數民族自決自治的目的，要在「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才能達到，此中實大有深意。

中國歷代民族

政

策批判的批判

中國共產主義者，除了主張少數民族的自由分立權外，他們還攻擊中國歷代及民國成立後的民族政策。中國歷代以來及民國成立後的民族政策，當然不能盡如人意，但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祇從軸的黑暗面出發而不看一看他的光明面，竟將他的結論，祇建在這黑暗面上，當然是陷於錯誤的。

近來中國共產主義者，在他們的宣傳小冊子中，常常攻擊中國歷代民族政策。他們說：

『中國的民族政策是在不誠意的威德二字上來對付其他民族的。牠之所謂「威」，

無非是用軍力來征服其他民族，牠之所謂「德」，亦無非是用政治來消滅其他民族。」於是他們認為歷代民族政策的內容是：

(1) 征服和屠殺

(2) 要求納貢和剝削

(3) 挑撥離間和以夷制夷等等（抗戰中的中國民族問題，黃操良著）

中國歷代民族政策的錯誤，我們以為與其說錯誤在消極的殺戮，剝削和歧視，毋寧說錯誤在沒有積極的領導和扶植。他們將中國歷史上民族政策的基本內容認為是屠殺，這判斷並不正確。中國素來是一個講王道的國家，他對於異族多半依據柔遠人懷諸侯的「柔」與「懷」的態度。所以「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是其唯一的信條，拿殺戮做其政策的基本內容，沒有那一代敢這樣主張過。當然，種族間的衝突紛爭，有時相互殺戮，其慘狀紀在史冊也非常的多。這是一時的變態現象，並不能影響其根本精神。偶然從史書上摘取一二段慘酷事件，即下結論，這當然不是科學態度。如果摘幾件漢族屠

殺異族的事實來立論，我們也可以摘一些匈奴突厥吐蕃各族慘殺漢族的事實來作異族屠殺漢族的證明。這種相互衝突磨擦的史實，是各民族間不可避免的現象，這不一定是民族政策。民族政策的研究，不在片段的衝突與和平的幾件事實，而在其一貫的施政綱領，祇有這綱領才能作證。

其次，他們把史書記載的「納貢」看為漢族對於異族的一種剝削，這也非常錯誤。納貢的財物，並不是很多的，目的在各少數民族的珍奇物產作為象徵以表示臣服的意思。歷代的納貢，並不限於國內少數民族，鄰國亦有納貢之舉，此種財物乃是那時國際間表示親善的相互贈禮，史官自大亦稱為納貢，這那裏是一種剝削。何況統治者的封疆大吏及其子民往往亦納貢表示愛戴之意，這更非民族間的剝削的表示。

至於歧視的現象他們說：「中國「夷」「狄」「蠻」「戎」在文字上就把他們作為「犬」「蟲」之類的東西，中國在古書上講邊荒民族的情形，都是寫得像山海經上的離奇古怪」（書同），其實這祇是文化水準高的民族視文化水準低的民族的一種傲慢名詞，

但這不能代表對異族的政策。中國向來抱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胡越一家」的古訓，這才是中國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如希特勒那樣歧視猶太人的政策，在中國歷史上却還沒有發現。

總之，中國歷代的民族政策，錯誤在消極的羈縻漠視，沒有積極的去領導扶植，如果將上述的不正確的理由來作分立權的藉口，這在共產國際固自有其國際主義的立場，但在民族危機千鈞一髮的時候，中國的青年竟也不顧一切的附和起來，那是何等的一種危險。

中山先生的

民族政策精義

中山先生對於歷代這種消極的民族政策向來是反動的，他素來是抱着積極的扶植的態度。一九二二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於規定「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後」。「覓規定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他們竟主張「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陳伯達在他的「三民主義概論」上說

，說：「中共這個規定與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規定，在原則上過大體一致的。」這種曲解，真是別有用心。中山先生主張的『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那裏是原則上會向於共產主義者主張的『聯邦制』呢？真是不知所云。中山先生對於聯邦制，他在批判從前的聯省自治派，早就痛斥過了。中山先生說：

『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該把各省再來分開』，共產主義者主張的聯邦制，和聯省自治派，本質不同，可是十個學美國，一個學蘇俄，把原來統一的中華民族，想先把他們分割開來又再來聯合，這種削足適履的辦法兩者是相同的。無論如何，中國共產主義者的立場，始終是站在國際主義而效忠於共產國際罷了，於中華民族的解放是不利的。

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在積極一方面更與共產主義迥異，不但主張少數民族的自決自治，要統一不可分立，要從統一中去求，而且在自由統一中，應仿效美利堅民族或瑞士民族的先例，將許多不同的民族合爲一爐而鑄鑄之。美國民族最爲複雜。就種說，有

黑種，白種，紅印諸族，就白人說，有英荷德法俄各國的人，這一萬萬人口的各個民族，竟同化成一美利堅民族，實是令人驚異。

中山先生說：『像美國這樣的民族主義，才是積極的民族主義，這樣積極的民族主義，才是本黨所主張民族主義的好榜樣。』『兄弟現在想得一個調和的方法，就是拿漢族做中心，使滿蒙回藏四族都來同化於我們，並且讓那四種民族能够加入我們有建國的機會，做效美利堅民族的規模，把漢滿蒙回藏同化成為一個中華民族，組織成一個民族國家。』

這種漢族中心主義是否是共產主義者所說的大漢族主義？絕對不是的。這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主義。因為漢族文化較高，人口佔絕對多數，當然有領導扶植的責任，難道這和莫沙里尼用飛機炸彈向阿比西里亞人傳播文化的性質相同嗎？所謂同化，當然是平等的互助做到自然同化，不是以霸道的武力來壓迫同化。各族彼此作用，彼此融合，其實中華民族的五族，幾千年來，無論血統，風俗，

文化語言，中山先生早已見到他們在彼此同化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個中華民族，各族間要指出某族絕對的特徵，幾已不可能了。

五、中華民族原來就是一個民族

中華民族內在分
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從國際主義的觀點，常常將中華民族內的

立或統一的問題
滿蒙回藏苗等族，認為是若干分立的民族，以致根據此種觀點而主張

◆蒙回疆有自由分立權的聯邦制。究竟中華民族原來是一個民族？

即是分立的若干民族，這個問題若得到解決，他們主張之是否錯誤，也就知道了。

中華民族的構成部份，過去雖大別為五族，其實據近人（梁啟超等）的研究，實可分為十一族，即苗蠻族，蜀族，巴氏族，徐淮族，吳越族，閩族，百粵族，百濮族，氐羌族，北狄族，東胡族。其中除已和漢族同化族界已完全泯滅者外，所謂滿族，即東胡族，蒙回即北狄族，藏族即氐羌族。此外苗蠻族，現仍棲息於湘黔桂諸省。以上諸族，

數千年來，和其他各族，彼此的文化互相交流，到現在究竟是若干分立的民族，抑早已彼此融化成爲了一個中華民族，這是一個根本問題。

近來有些研究家，已獲得許多寶貴的論證，他們不但指出國內各族早已同化，而且更進一步指出各族原是同種，我們從這些研究中，已尋出中華民族原來是一個單族的科學基礎。

翻開中國歷史，首先看到的就是黃帝與蚩尤的戰爭。大家都以黃帝代表漢族，蚩尤代表苗族，其實這個戰爭究竟是否漢苗之爭，在歷史上尙是疑問。有些歷史學家對此問題，對蚩尤與炎帝疑爲一人。（見呂思勉編的本國史）因阪泉涿鹿，古人多以爲涿鹿也然「史記」「五帝本紀」多同「大戴禮記」的「五帝德」，「帝繫性」兩篇，而大戴禮記，只有黃帝和炎帝關於阪泉的文字，並無與蚩尤戰於涿鹿的記載，可疑一。而且蚩尤和三苗，昔人都以爲是九黎之君，三苗和炎帝，同是姜姓，可疑二。阪泉與涿鹿兩地，實卽一地，漢史記集解引皇甫謐謂阪泉在上谷，又引張晏謂涿鹿也是上谷，「正義」引晉

「炎帝地理志」，又謂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可見涿鹿阪泉必定古說都在一地，可疑三。無論如何，這戰爭必定是姜姓與姬姓的戰爭。大約姬姓居河北以游牧爲業，「史記」說周帝「姜姓往燕燕常處，以師兵爲營衛」，這好像是游牧人民，姜姓居河南，以農耕爲業，農耕人非游牧人之敵，故黃帝將炎帝擊敗了。

（王桐齡著）「中國史」所載「炎帝榆罔在位，中國大概分爲三部，極北爲蒙古族之蒙弱所據，南爲苗族之九黎所居，漢族卽界於兩族之間，炎帝孱弱，九黎之君蚩尤北攻漢族，炎帝逃於涿鹿，諸侯黃帝領兵征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克蚩尤殺之。」即依舊說，這次戰爭是漢苗兩族的戰爭，但漢苗兩族是兩個民族，抑是兩個民族，仍應深加研究。現在苗族學家，他們認爲漢苗並不是兩個民族，實乃兩個民族，這是白風土說及語言學來論證的。

◆ 漢苗同源說
中華民族內的滿蒙藏諸族，滿族人口極少，且已同化，已不必論，
的實地研究，藏蒙諸族與漢族同源，亦已有研究家證明過了，（胡石青：「蒙藏民族是

否炎黃子孫」經世月刊一卷八期）茲不復贅。我們要特別提出討論的，就是漢苗兩族究竟是否同源呢？因漢苗兩族是一般人從歷史紀載上最易認為是兩個分立的民族，現在且將我在貴州時苗族方言講習所，羅榮宗吳修勳兩教授研究所得供給我的論證略述於後：

我們以為苗族與漢族是中國古代的兩個民族，祇是中華民族內的一支族，由名稱來說已可證實。「書」稱苗族為有苗，說文：「草生於田者穀曰苗。」古代氏族，多以其族所能製作之物為名。苗族至今多業農，其族之名，或即用他們所能製作的東西來稱呼。古代氏族的稱呼大多如此。在古籍上所見可以相比較的，如有巢氏，有禹氏，有虞氏，有緡氏，有蘇氏，有莘氏等等。

在風俗方面，苗俗多能墨守祖先的成法，若以他們敲牛祭祖的典禮來看，實同甲骨文「卜辭」上所發見殷商殺牛祭祖的史實。苗家祭祖多在七八月間，祭時多殺一肥碩牯牛，殺之前，必以鬥，四月八日牽鬥牛來，相與省視，對於祭祀所用牲物，皆是特別喂養過的。這種習俗，和漢族極相似。「禮」祭義說：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饗獻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恭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

又說：「居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之龜甲文上亦有「王往省牛」之語。足是古人祭祀，特養牲牛，現苗族祭祖的牛，特別早期蒙養，實在古意。養牛的人穿着禴服，以傘遮牛，都是表示愛護的意思。牛到之場所，要鳴三砲來歡迎，這不是示敬又是什麼？

退一步說，這種習俗的偶合，尚不足為強有力的證據。但言語學上的論證，那要算最有力的了。

語言的實與量，因隨時代而變遷，即一字的發音，在古和現在也不相同。如「兒」字「而」字，在詩韻列入四支，用今音來讀便不合。押韻時是讀「倪」或「飴」，恰像粵語的韻音。又如佳字街字諸字同列為九佳，如用今音來讀便各不相同，但押韻時，「

佳」字讀「街」字音，「諾」字讀「該」字音。這種讀音亦如粵語。因粵語多近古音，故有人說古音當在粵語中去尋求，這是不錯的。如果我們將苗語與粵語比較其讀音，相近的却不少。例如安順府「苗志」語呼雞爲「噉」，狛家苗呼雞爲「蓋」，「駝書」所錄苗語稱雞爲「介」，水家苗亦稱雞爲「介」，這些音若用粵語讀音恰正相同。又如狛家語讀雞帽爲「冒音」，「冒」顯然爲帽音，但「音」字音便不可解，若用粵省讀音，「冒音」即「氈」，這是苗語的倒裝句法。此外狛家語稱糯米爲「阿那」，粘米爲「阿音」，那爲糯米，音爲粘，用粵音讀，又極相似。又苗語呼油燈爲「當油」，升斗爲「例盛」，都是倒裝句法，且合粵音。至於呼冷爲「臺」，呼香爲「精」，呼酒爲「又」，稱父爲「阿巴」，稱母爲「阿味」，和粵語更絕對相同。其他稱刀爲「零」，稱臉盆爲「論盆」，稱門爲「西」，稱金爲「扛」或「工」，稱銀爲「案」，稱錢爲「元」，稱烟爲「應」，皆是粵音。粵音苗音的相符之確證，以苗語尚保存着古音，可是苗語漢語之同源而異流，亦可證明苗漢兩族之同源而分支了。現在我們再舉些單語爲證：

孤：唐韻，古乎切，一禮玉藻：凡貴稱小國之君曰「孤」；「野乘釋名」，國君
輒稱曰「孤家」，又子處亦曰「孤」。今水西花田稱「我」曰「孤」，貴陽狎
家苗稱「我」也。孤，羅解，犛波之專家稱「我」亦叫「孤」，下江縣獠家稱
「我」亦做「孤」，皆讀若粵音——卽國語的去聲ㄍㄨ——是漢語的古音古稱。
唐韻，武庚切，正韻，眉庚切，音官，說文，民也。今苗夷語第一人稱曰「孤」，
第二人稱曰「氓」，下江縣獠族第三人稱亦曰「氓」。

未：唐韻，正韻，無沸切，音昧，玉篇「未」猶「不」也，「未有」卽「不有」。
今貴陽狎家稱「不」讀如粵音的「未」。

墓：俗韻，蒙肺切，音摸，說文，兵也。鄭玄曰冢墓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今漢
語多讀「墳」或「坟」。獠語，狎家語，犛語均不讀「坟」，只讀做「慕」。
「古」，「掃墓」讀「尸」，「古」。按王制，墓地不諱，損子方音，凡類語均
謂之墓，有墳謂之塋。說文曰：古者謂之墳，（註）土之高者曰墳，隸人

夷韻語言稱「羣」不稱「墳」，蓋古羣不墳之意也。

戒：廣韻，古拜切，音介，說文，警也，書大禹謨，警戒無虞，戒之用休，聘禮，戒上介亦如之「註」尤方也。今撞語謂「不要」或「勿」皆讀若與音之戒。例如說「不要去」曰「ㄍㄨㄛˋ」，「勿說」曰「ㄍㄨㄛˋㄨ」，皆合警戒與命令之意。

趣：篤韻，音卑，行也，今棘人夷語，謂「行」曰「ㄅㄨㄛˋ」或「ㄅㄨㄛˋ」。皆趣之音轉也。

軀：玉篇，力登切，音憊，身也。今撞語狎家語，稱「身」曰「ㄉㄨㄛˋ」卽身之音轉也。

曼：是天空之稱呼，如蒼曼，穹曼，廣韻，武庚切。集韻，韻會，眉貧切，音珉。說文，秋天也，爾雅釋文，曼爲秋天。（疏）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曼天。書大禹謨，曰號泣於旻天，（傳）仁覆愍下，故曰天，旻詩，小雅，旻天疾威。

，(訓)曼，幽遠之意。

冥：亦天空之稱呼。唐韻，莫經切，集韻，韻會忙經切，正韻，眉經切，音銘，楚辭九章據青冥而揚虹，青冥，天也。文天祥正氣歌：沛乎塞蒼冥，蒼冥，天也。說文：幽也，幽深貌。曼，冥，同音，意義亦大都相同。今貴陽侗家稱「天」爲「ㄇㄏ」，羅斛夷家，亦呼「天」做「ㄇㄏ」，天柱侗家語呼「天」亦爲「ㄇㄏ」，皆讀若國音之「門」，西南漢語之「悶」，蓋「曼」「冥」的轉音。按苗夷社會，以農業爲生活，要滿足其慾望，端要望歲稔豐此，「曼爲秋天，萬物成熟」這是他們的意識受生活的反映，故呼「天」爲「曼」。苗夷語之保存「Man」的古音而且也有古意。

濛：集韻韻會，謨蓬切，音蒙，論衡，溟溟濛濛，「春秋命歷序」濛濛萌兆，濛濛濛鴻，元氣未分貌，今黔桂邊界撞語呼「天」做「Mong」陽平聲，又另存一古音而其意更古。


麗：唐韻，卽計切，正韻，力霽切，音隸。楚辭招魂，被文織麗而不奇些，前虞東

方朔傳，以道德爲麗，玉簪，好也，廣韻，美也，今貴陽狎家讀「麗」爲「

」(力一)讀如國音「梨」，若西南漢音之「利」，卽「麗」字安南及羅解

勃波，夷家均讀做「lei」(力一)若國音之「雷」，恰恰符合鼻音讀「麗」

字，更近古音。更有值得我們注意者，今暹，狎語族婦女服飾，衣襟及袖緣

均繡以  花紋以麗之，此殆種語麗之取義乎！

麗：聲韻，民堅切，今做「眠」，貴陽狎家，羅解夷家，下江猓家，天柱侗家，

稱「睡」爲「Zie」(力一)與鼻音麗同韻。

各：今文「吾」唐韻，五乎切，集韻約會，正韻訛胡切，音梧。說文：我，自稱也。

吾字見於古典經籍者最多，蓋古之口語也。今猓語稱我曰「Zie」，粵語讀吾

亦曰「Zie」適與猓語相符合。

韃：集韻，約會，正韻，敵禮切，音穰。玉簪，本作特。特，朴特，牛父也。玉簪

，牡牛也。書舜典，格於藝祖用特。又牡，亦曰特。廣韻，特雄也。今獐家謂獐家語皆稱牡牛曰內特。『DE』，稱牡馬曰『馬特』。『MA-DE』。

癩：篇海類編，音癩，病也。讀粵音略，入聲，今棘人夷語，患癩稱『癩』，頭痛曰『斜』，腹痛曰『Duy fet』。

闔：粵韻，當孤切，集韻，約會，東徒切，音都，說文：闔闔也，從門者聲，廣韻，城上重門。玉篇，城門臺也，詩，鄭風，出其闔闔，今棘人夷語稱『門』曰『闔』(TU)陽平聲，恰與粵音『都』字符合。

壓：廣韻，集韻，約會於鹽地音厭。玉篇飽也，足也。今棘人夷語，如狝家，獐家冷家，皆稱『飽』做『壓』(B)讀陰平，恰與粵語讀『壓』字符合。

蜡：助駕切，音乍，年終祭名。禮運，仲尼與干蜡賓(註)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蜡。郊特牲，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祭之蜡，廣韻作蜡，今獐家稱『除々』曰『Ham Zam』。Ham者皆為Zam即

蜡字讀鼻音。成文爲昏蜡字置文法也，蠟祭爲周禮，豈瑠族爲有周之遺民乎？語言是一個民族特徵之一，語言相同或近似自然是一個民族而分支的兩個氏族。最個人易認爲兩個分立民族的漢苗兩族，我們從各方面研究，均得到同源的結論。在暹羅泰族主義，被日帝國主義，利用來煽動苗族同胞的時候，在國際主義者正高唱國內少數民族有自由分立權的時候，此種研究，實爲一種重要論證。

註：我在此不能不附帶一說的，上面的材料，是羅榮宗吳修勤兩先生到苗區實地研究的結果，羅先生是在美國專研究民族學的學者，此次草履屢裝，深入貴州苗夷區域，與苗夷共寢處者數年，故其論證尤值吾人注意。吳先生本人卽是夷族，夷語與漢語均精習，由夷族的同胞來印證，更覺此種材料的珍貴與正確。

以上所述，皆我在貴州方言講習所任教時，兩先生所供給者，他處尙未發表。

◆ 國內各族 ◆
中國境內的各族，既是同源而異流的各個支族，所以中華民族事實
上就是一個民族，毫無疑義。假使有人還疑爲是各個民族，但各個民族

一 文化交流

◇ 的文化交流，經幾千年來的錯綜繚雜，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也早已同化爲一個民族了。由歷史上我們知道國內各族歷史就已互通婚媾，互換姓氏，互相模倣，也早化合成爲一體了。就最顯著的史跡來說：漢族的文化中也滲有不少苗族的成份，其著者如鐵製的武器，五胡亂華以後，漢族即與滿蒙漢族的一部份即鮮卑與氐羌互相化合。所謂漢族文化中又滲入不少鮮卑與氐羌的成份，如牀，椅，靴，鞵。到後唐，後晉，後漢，西夏，遼，金，元，清，諸帝進駐中原以後，漢族復與回藏諸族的全部或一部互相同化。所以現在中華民族實在是國內各族的共同產物，帝國主義者或國際主義者要想分離她，祇不過是有別作用罷了。

自然，在各族中，也還有少許的蒙人藏人苗人，尙未同化。但以他們人口數目的比較，已經不能影響這共同的全體。

一個民族中，尙有許多未曾完全同化的支族，這在歐美民族中也是常見的。例如德

意志民族內的普魯士人與拜陽人 (Freyen)，普魯士人多黃髮高大，多用低德語，信新教，拜陽人多黑髮矮小，多用高德語，信天主教，兩族血統不同語言不同，宗教不同，而且感情也不融洽，但並不妨礙德意志民族的構成。又如美國是合各種種族民族於一爐的民族，至今美國大城中各族人民猶有其特殊築居之所，形成大社會中之小社會，如華埠（唐人街），小墨西哥，小意大利，小俄羅斯，小日爾曼等等，這也並不妨礙美利堅民族的構成。共產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專從中國各個民族間的異點觀察，希望達到其分立中華民族的算計，這已經不是科學研究，乃是一種政治動機。一顆樹上的枝葉，沒有兩片是相同的，我們便可據以否認這顆樹是一個整體嗎？

六、民族道德的本質和形式

恩格斯與

杜林

林的論爭

在民族問題中恢復民族的固有道德，也是一個重要問題。關於民族固有道德的問題，共產主義者和三民主義者的意見，也非常相左。共產主義者的道德觀，他們是以唯物史觀來解釋，恩格斯在反社林論中，由

經濟的歷史的觀點出發，他爲了要否認道德的本質，所以他不能不先否認杜林的永恒不變的真理。恩格斯既然以爲真理是歷史的產物，當然，真理也不過是相對的真理了。然而除相對的真理外，共產主義者又不得不承認一個爲相對真理之總和的絕對真理，既承認一個絕對真理，那麼，這絕對真理和杜林的永恒不變的真理的差別點究竟何在呢？共產主義者始終未曾加以說明。

現在且將我們的意見略爲指出。我們以爲絕對真理之承認，的確是非常必要，否則誠如杜林所說，將陷於腐蝕的懷疑論。當然，所謂絕對真理不是杜林所理解的永恒不變的真理，因爲在認識中的絕對真理，仍是對於相對的真理來理解的。所以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差異，仍祇是相對的。觀念論者，抱着一個永恆的絕對真理，唯物論者也祇抱着一個流變的相對真理，在三民主義者看來，相對真理的相對性，如果不是絕對真理的相對性，就不能不承認一個絕對真理，但絕對真理的絕對性，在認識中，如果仍是對於相對真理來說的話，就不能不承認一個相對真理。所以一定的社會歷史中，如存在相對真理

理，便不能不同時有絕對真理的存在。「流動」與「永恆」，「變」與「不變」，她的差異點祇有在「相對性」上才能理解。

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對於道德，便是根據於這極深刻的原理來的。他之所以要依

的道德觀

復中國的固有道德，就因為看見：

「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所以 中山先生一方面承認道德有新舊，一方面又承認道德有好與不好的本質。

中山先生是將道德的永恆性與流動性由相對的觀點來統一的。在道德的流動變遷的形式中，去把握着那相對不變的本質，承認道德是社會歷史的產物，但同時也承認道德的本質是相對的超社會與歷史的。當 中山先生有一次進了一所祠堂，看見那個「忠」字被拆的時候，他便覺得不對。他說：

「在國家之內，居主可以不忠，「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忠」字可以不忠，

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爲四萬萬人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

可是 中山先生不僅看到流動變遷的忠君，忠國，忠事等等重德的形式，他同時看到了那超社會歷史的道德的相對的不變本質，那本質就是「忠」。忠的形式可以因時代而變遷，但作本質看的「忠」便相對的不再變了。須知「變」與「不變」，都是相對的。共產主義者所理解的那個絕對的「動」，其實那絕對性仍是對於相對性而言的絕對性。這種道德的不變本質，在世界上要算中國倫理學家發揚得最爲透澈，最爲豐富。中國這個在道德本質上的開發，在中國民族文化中要算一個極重要的部份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不僅是中國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且也是解救這強凌弱衆暴寡的世界的一條出路。不論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空間，這些道德的本質都絕對需要。共產主義者向來諷笑這種道德的本質爲一般的無具體內容的原理，我們祇要想一想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領土，屠殺中國人民，燬滅中國財產，這種種非道德的行爲，他們正缺少這一般的道德本

質，無論將這些道德本質化成何種的道德形式，都不能辯說他們這類的殘暴行為。中山先生要恢復的固有道德，正是此種偉大本質的道德，假他的主張不幸被人們所誤解。舊時封建的遺孽，竟以為中山先生所要恢復的固有道德，就是固有道德的形式，不是固有道德的本質，似乎中山先生是要將古時「忠君」的道德形式恢復過來，用之於民國的那樣誤會。不知中山先生祇恢復古時「忠」的本質，並非恢復古時「忠君」的形式，這是非常明白，可是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現在又來曲解中山先生的意見。陳伯達說：「中山先生是不承認有不變的道德的。他以為舊時代君主的教「忠」教「孝」，這是封建的道德，中山先生不是保存這樣的道德，中山先生是將道德的舊瓶裝入新酒來作革命的實踐。」這完全是以唯物論來解釋中山先生的道德觀點。試問：中山先生承認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究竟是不變的道德抑是流變的道德？這些道德者果是對建道德，為什麼在資本主義社會甚至於社會主義社會也通用呢？難道社會主義的社會就用不着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嗎？假使和平兩字是一般的抽象意義，究竟誰能擔保

的和平降級的「和平」二字，是有一種什麼樣的具體內容呢？即使「和平」有一定時期的具體內容，何以見得「和平」的一般本質就沒有用呢？共產主義者他們只看見「一定社會歷史的流動變遷的道德形式」沒有或者輕視這貫通社會歷史的相對不變的道德本質。他們反對觀念論者的永恒真理，忘記了永恒真理和相對真理的相對性的理解。已經顯示了他們的偏執，不料我們在歷史上產物的道德觀，更進一步走到了階級性的道德觀。於是道德祇成了一種鬥爭的工具，一種經濟的附庸了。

恩格斯說：「如果近代社會中的三個階級，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各有他自己的道德，那麼，我們從這上面，祇能得到這樣的結論，即：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是從自身階級地位所處物質條件中，就與他們自己的生產及物品交換的經濟條件中，取得自己的道德觀念。結果，我們得到一種階級道德，恩格斯以為道德總是階級的道德，這是一種片面的錯誤觀念。我們以為階級的道德祇是道德的形式，若是道德的本質，那就沒有什麼階級性的。不論什麼階級都一樣承認

。譬如我們所講的「信義」，其具體內容雖或所見有所不同，但任何人對於其夥伴，都不能不講信義，信義的本質却沒有改變。這種一般的道德本質之所以有絕對必要，就是每一社會裏都有反道德行為的人。而且道德的形式，就算牠果有階級性，依同一原理，也不能不有道德的民族性，這也是事實。若道德的具體內容是階級的，我們也可以說道德具體內容不能同時是民族的。人類間縱有階級的分野，難道我們可以否認民族界限存在的事實嗎？

人類有民族和階級的存存，這是社會一時的病態現象，若果道德祇是階級的道德，那末，原始共產社會及將來新共產社會成立後，階級消滅是否還有道德的存在呢？若道德存在，但是否仍具有階級性呢？

恩格斯「勿偷盜」這個道德的箴言，是不適用於一切偷竊的動機都完全消滅的社會，換言之，就是財產已歸諸公有的共產社會。可是，偷盜的對象是否祇限於財產呢？在私存財產的社會，偷盜可以財產為主，但私有財產消滅後，人類的社會中就沒有一種專

物引起偷盜的動機嗎？誰也不能武斷。因為人頭除佔有慾外，還有創造慾，自尊慾，現社會中有偷盜他人的科學發明及文學創作等現象以博取名譽，我們一定說此種現象絕對不發現於將來的社會，這才真是抽象的說明。所以「勿偷盜」這箴言本質，仍然不能廢棄。

將來的社會是怎樣的一種組織，讓烏托邦主義者去推論或設想罷。大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固然是我們所公認的一種真理想，但不難所說而祇取所需的人，何以才能絕勝於將來的社會？假使因某種物產不足而為社會規定，祇限於某一部份最急需的人取用，不急需者即令因產量高尚不發生偷盜的行為，其實還不是因有「勿偷盜」的道德本質存在的原故？

共產主義者謂經濟決定道德，但不能不同時承認道德亦能決定經濟，問題是兩者的相互作用，何以儘能明經濟為起作用而道德為反作用呢？若階級鬥爭是經濟的必然結果，但中華民族內各階級都能為國家之急，一致相團結起來去對付外在的日本帝國主義

的侵略，這不能不承認道德力對於經濟力的克服。在這樣的範疇中，經濟力已居於從屬的地位了。

總之，三民主義者以為道德形式是歷史的產物，可以因一定的社會時代而有不同，然而道德的本質，却相對的依然不變。中山先生對於中國固有道德有保存發揚的主張，就是基於此種原理。

七、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真正肩負抗日與

統

一的黨是國民黨

由於中國國民黨以民族主義包藏國際主義，中國共產黨以國

際主義涵蓋民族主義，所以真正肩負抗日與統一的黨是國民黨而

不是共產黨。近來共產黨鑒於民族意識的高漲，階級意識的沒落

，為取得人民的信仰，另謀黨的新出路，於是乃喊出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在延安各學校中，關於民族統一戰線這一教程裏，他們對許多青年宣傳，是共產黨在九一

八以後開始發動的。現在抗日統一戰線之所以能形成，全面戰爭之所以能開展，完全是由於共產黨的努力。他們不但歸功於己，而且還要加罪於人。洛甫在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一文中竟說中國共產黨能：

『號召全中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不分階級不分黨派，不分職業，結成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

『全中國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人民，都一致擁護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一致響應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這一號召恰好代表我們的願望與要求，顯然的誰也會看到，站在抗日救國第一線的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吧！』

這種揚己抑人的口吻，自然是共產黨的慣技。但最令人捧腹的，他們竟大言不慚的說：繼承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傳統也是共產黨。他說：

『在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指國民黨）叛變革命之後，中國大革命是遭受嚴重的失敗，革命高潮是向下低落了。工農羣衆們……特別是廣州公社的烈士們，已經指出

了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求得解放的新的道路，在他們的紅旗上寫着的，正是：民族獨立，民權自由與民生幸福的薩維埃的新的中國；正是他們，繼承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傳統，繼續了大革命所未竟的事業。』

假如共產黨真是繼承了中山先生的主義及其事業，國民黨自然歡迎共同努力。可是共產黨是否真是這樣呢？是否對於抗日與統一的工作真的站在第一線呢？這是我們要檢查的。不幸得很，事實告訴我們，真正肩負着抗日與統一責任的黨却是國民黨，而共產黨對於抗日統一的事業，十年來直至現在，他們客觀的遺正在障礙着，破壞着，當中山先生正積極的從事於統一中國的工作時，共產黨還僅僅是一個雛形的組織。當我們偉大的民族領袖蔣先生正奮發苦卓絕的努力於中國的統一鬥爭時，共產黨却還在扮演張獻忠李自成式的丑劇。就是目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戰過程中，共產黨又做了些什麼工作呢？我們將在下面再說。談到抗日，中山先生——國民黨的總理才是一個抗日的急先鋒。早在民國八年，中山先生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演說，就看清了日本利用中國

軍閥來征服中國的謬計。他看見中國學生去要求那與日本訂買鹽鐵的軍閥去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不可能的，所以勸他們『重新革命，以盡去此暴竊之人。』民國九年中山先生在美國議員團歡迎席上，也說：

『二十一條款和軍事協約，是日本製的最嚴毅的鐵鎖鍊，束縛中國手足的。實行二十一條款於中國，就是日本把中國整個征服了。』

中山先生很堅決的說：

『我們革命黨，一定打到一個人不廢，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了，才歇手。』

我們想想，打到一個人不廢的態度，這還不是抗日的最積極的態度嗎？

而且中山先生的抗日，他是與國內的統一問題聯繫起來看的。他以為中國的混亂關鍵就是二十一條款，『如果這二十一條款能够廢除，就再沒有混亂了。』但要廢除二十一條款，必然要有一個統一的中國，『因為一個統一的中國，儘可以對抗日本的壓迫。』抗日和統一，在中山先生看來，可說是互有因果關係。民國十三年在大阪神戶國

民黨的歡迎會上，指出中國內亂之因，更明顯的說出此種關係。中山先生說：

「中國要和平統一，爲什麼我要主張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呢？和平統一是一內政問題，廢除條約是外交問題，我們正講內政問題，爲什麼要牽涉外交問題呢？……因爲我們革命黨要中國從此以後，不發生軍閥，國民能够自由來解決國事，中國永久是和而統一，根本上使要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不能活動，便要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因爲要消滅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所以講內政問題，便牽涉到外交問題，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中山先生在日本演講大亞洲主義，不但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大亞洲主義，反而給日本人當頭一棒。提醒他們東方的文化是王道文化，歐洲的文化是霸道文化。他對日本人說，你們究竟是『要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鷹犬，或者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但日本人畢竟做了西方德義的鷹犬了！

中國國民黨和牠的 總匯 總裁，一貫都是爲了抗日與統一而奮鬥的。但國民黨却

沒有玩弄新奇名詞來刺激中國青年，他們也沒有高唱什麼抗日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他們祇稱這種革命爲國民革命。自中山先生逝世以後，他的統一與抗日的遺志，便由總裁繼承下來。民國十五年，總裁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出師北伐，向統一的大道邁進。迄武漢克服，江浙奠定，十七年克服濟南而有五三慘案，遂與日本正面抗爭。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國民黨感覺到一個國家要抵禦外侮，革命的中心勢力必先要團結起來始有辦法。二十年十一月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對黨內同志諄諄以『一德一心恢復互信』相勗勵，在黨內團結以後，還『切望全黨同志，遵守決議，戮力從事，團結全國同胞，實行全國總動員，以一致之步驟，最大之決心完成建國之大任。』

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國民黨完全本團結禦侮的方針，召集國難會議與國民救國會議。所謂團結禦侮，不也就是統一抗日嗎？會議之目的，第一爲集中全國專門人材之計劃，使成一整個的對策，其二爲集中全國人民之意見，使爲一整個的表現。所以說：

『黨離民衆，國黨無與立，民衆離黨，則國無以存。』

這是四屆一中全會宣言的導詞。可是當國民黨正努力團結黨與人民一致禦侮之際，不料共產黨反於機關感民衆向外變的動線進行。他們的口號：

「推翻國民黨是反帝圖主義民族革命戰爭的先決條件。」

「蘇有蘇維埃中國與中國紅軍才得保證中國民族獨立解放及統一中國。」

可是他們仍然把一黨的利益看爲高於民族的利益。一二八淞滬戰起，十九路軍與中央軍正沐血苦戰，共產黨又乘機加緊壓肘抗日的各路聯軍。這時國民黨的抗日統一大業，受此內外夾攻，真瀕於危境。就如四屆三中全會宣言所說：

「以我國民性之誠樸，土地之豐饒，生聚教訓宜有可觀，乃因赤匪奔突，村邑爲墟，鹽池既廢，番雜不治，遂使安內攘外，兼顧兩難，本黨一年以來，所徬徨憂思者，莫過於此。」

民國廿二年一月，榆關告警，繼而熱河淪陷，喜峯口，古北口淪役，國民黨將士冒飛機重砲之威力，以死相持。當北方戰事緊張，不料共產黨又乘我部隊北調，極力向中

與進攻，並向國民黨軍官，以甘言相引誘。他們以紅軍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通電，囑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美名，實則仍進行分化中央抗日軍隊的陰謀。國民黨當時對於救亡圖存的大計，仍以集中國力和充實國力為絕對的必要。所謂集中國力，就是「要使國家首尾呼應枝幹連繫成爲一個極爲密實的機體」。所謂充實國力，是「要使國家血脈調暢肌體充實成一表裏健全的封體」。二十三年以後至七七抗戰，均本此原則進行。我們以一弱國而對抗世界五強之一的日本，三年有餘，愈戰愈強，那不能不說是受此原則之賜。這樣看來，站任抗日救國第一線的是中國共產黨呢？抑仍是中國國民黨呢？洛甫先生大概不會抹煞歷史的記載吧！

共產黨抗日統一

線的理論與實際

以上是抗戰前的事實，抗戰以後共產黨打出了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後，究竟他們實際又做了一些什麼事呢？毛澤東說：「一切共產黨員，毫無疑義，應該依照自己的一貫的革命總方針，自己的決議與宣言，同中國國民黨與其他黨派，全國廣大人民一道，誠心誠意的實

行三民主義。誰要是不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信奉與實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裏不一，誰就不是一個忠實的馬克斯主義者。」

但毛澤東所擁護的三民主義，却是立在國際主義的而不是民族主義的觀點上所理解的三民主義。他說：

「在現在抗戰的階段與戰後徹底完成民主共和國的階段，都是三民主義的階段。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

他把三民主義革命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就是戴上國際主義的眼鏡所見到的。由於這種國際至上而不是民族至上的觀點，所以他們主觀上縱或想「心口如一」，但客觀上一檢討他們的理論與實際，仍不能不陷於「口是心非」了。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關於詳細的解釋，要算毛澤東在共產黨擴大六中全會「論新階段」的一個報告。第一、他對於統一的形式是以各黨派合作的組織提出的。他還聲言要長期合作。怎樣才能長期合作呢？他以為實行互助互讓政策。他說：

「互助就不是互害，損人利己在個人道德是不對的，在民族道德更加不對。因此，無理的磨擦，甚至捉人殺人等事，無論如何是受不得的。共產黨員決不應該以此對待友黨……互相規勸是朋友間的美德，也是政黨間應該提倡的作風。」

「一切我們所說的，共產黨員應該首先實行，不管對方某些人員或尙未用同樣的政策方法、態度對待我們，但我們仍然這樣做，做的久了，對方某些一時尙未明白的人員也會明白了。」

若果我們單從共產黨的宣言來看，單從上面的話來看，無論什麼人都要感動，都要以爲共黨的誠懇是今昔不同了。可是我們一從他們的實際行動，來印證他們的言論，我們感覺到這些用道德家美妙的言辭的說法，正是共產黨掩護他們行爲的烟幕，正是爲他們將來所犯罪惡而婆反宣傳所預留的掩飾。他們對友黨友軍不但不互助互讓，有時他們較之敵人還要更爲惡辣更爲兇恨。自二十八年一月以來，被共產黨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圍攻殺害之無辜士兵民衆，多至不可勝計。卽就有幸可稱被共產黨殺害的軍官士兵，團

民黨黨員，公務人員共約一千餘人。中共所屬游擊隊及其冀南各縣長殘殺的善良，自二八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七日之間不及三月，慘案已有三十五起。被活埋或慘殺或生死不明者，九十二人。其殺人方法『種上，栽下，砲了，活地獄』四種，可謂極人世間之慘酷。

對於友軍，十八集團軍以不容友軍一兵一卒在冀察魯等省立足為一貫政策。在冀河北民軍張蔭梧所部萬六千餘人，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止先後被十八集團軍解決。被磨擦專家反誣為磨擦專家的張蔭梧，遂不得不離河北。其他如民軍第七機隊司令趙侗之被賀龍解決鎗殺，夏維禮司令維禮所部之李本卿之被青年縱隊鎗決，以及鹿鍾麟沈鴻烈韓德勤所部在冀省魯省蘇北的軍隊先後被共黨軍隊襲擊，此等事件真說不勝說。其他如煽動晉省新軍叛變竟達十二團之衆，事後竟與叛軍合流，尤為駭然的事實。

這就是共產黨民族統一戰線的實際，至於抗日呢？十八集團軍最自負的要算他們二

萬五千里長奔的遊擊戰了。毛澤東說：

「全民族的第四個任務，就在於廣大的發展敵人後方的游擊戰爭，創立許多根據地，鞏固已有的根據地，因以縮小敵之佔領地，在目前，配合主力軍爲停止敵之進攻而戰，在將來，配合主力軍爲實行反攻而戰。半殖民地中國抗日民族戰爭的重要特點之一，在於游擊戰爭的廣大性與長期性，沒有這種游擊戰爭，便不能牽制大量敵軍有力地配合正面主力軍之作戰，而停止敵之進攻……。」

理論雖是如此，而實際呢？「自十八集團軍取得晉冀豫地盤以後，即一意以擴充擴軍東進南進爲圖，游擊之目標，不向敵寇而轉向友軍。如二十八年七月七日十八集團軍陳再道，周光燾等部萬餘人，分三路圍攻駐任縣北牛村之民軍王子耀部之際，連陞平堯山內邱之倭寇五百餘名亦向王部防地進攻。其時十八集團軍有二十倍於敵寇之兵力，竟不鳴一槍，閉風而遁，任王部孤軍對敵。又敵寇據冀中各鄉村據點者，每處兵力多者百餘人，少者十餘人，相距數十里，恆以汽車司聯絡，荷十八集團軍移其游擊友軍，收繳

友軍之行為，以肅清在冀敵寇，則敵寇有後顧之憂，斷不敢形其兵力南侵粵桂。」（是天水行營政治部報告）

所以有人說，十八集團軍游而不擊，這是不正確的。其實十八集團軍游的地方不是前綫而是後方，他們所擊的不是敵人而是他們宣言中要互助互讓的友軍。至於捕捉壯丁，阻撓役政，搜劫民糧，封鎖軍食，干涉司法，濫用酷刑，破壞行政，擅委官吏，綁架民商，勒索財物，擅發鈔票，禁運法幣，甚至包運仇貨，助長敵人的經濟侵略，種種行為，均有鐵證可據，這就是他們抗日救國的真正貢獻。

統一團結

的

基本原理

共產黨這樣的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據我看來，這是由於他們抗日統一戰線的理論根據是馬克斯列寧而不是中山先生與蔣總裁的。因為這東方與西方的幾個巨人，他們的哲學基礎完全不同。以致由此哲學基礎所演繹來的基本原理也就不同了。中國共產黨因為是國際主義，所以他們對於民族的統一，是依據於馬列的唯物辯證法，他們理解的統一是有內在矛盾的對立物的統一。

中國國民黨因爲是民族至上主義者，所以對於民族的統一，是依據於 中山先生的理想思想。這種理想思想，就是民生哲學的方法論，他是融化了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而另有其實質的一種最進步的理則（我另有一本小冊子專論這問題）。所以國民黨員有意的或無意的所理解的統一，是內在融合的一種有機的統一，這一個基點區別很大，這是了解三民主義之鑰，我們不可不十分注意。

大凡一個思想家，思想的起點就是這個最不易了解的「一」。因爲對於這個「一」的理解不同，才產生千萬流派的思想。中國的哲學家，早就注意到這個奇妙的「一」。易經繫辭說：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又說：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這就是說，天地萬物，由「一」開始，天下萬物的動變，其本質爲「一」。後來老莊，也注意這個「一」。老子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說：

「天地絪縕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這是說思想的出發點爲一，由一演變，終而不可完結。

西洋的思想家，早在希臘時期，也會對於這個「一」注意過。畢泰邁拉斯的哲學師是以「一」作爲起點。他以爲「一」是奇與偶之調和，此外巴門尼底和他的弟子齊諾，也是主一派。齊諾以爲「一」是不可分析，不生不滅，不動不變，無始無終，他們對於「多」是極大反對。近代美國的實用主義派，他們把一與多統一起來，可是他們不將多統於「一」而將一統於「多」，所以說本質仍然是多。

中山先生與馬克思列寧所理解的「一」，可以說根本不同。馬列的「一」是矛盾的對立的統一，中山先生的「一」是融合的有機的統一。有機的統一和對立的統一有什麼不同呢？第一，有機的統一是有機學的；對立的統一是有理學的。前者是「生」的守實

觀，後考是『物』的宇宙觀。自然，生的宇宙觀比較物的宇宙觀是更接於真理的。我們這個宇宙，皮相看去，好像是形形色色多種多樣的萬物，不僅自然界分爲動、植、礦三界，而某一物界中，又不知分爲許多種和類，所以這宇宙好像是『多』的。可是我們如果深入宇宙內作本體的探討，必定可以發現這宇宙是從『一』到『一』。換句話說，就是從『一』的出發點，仍然到『一』的歸宿點；而且這出發點與歸宿點，也是合而爲『一』，所謂『多』不過是現象罷了，動，植，礦三界，現在的科學家，尙沒有一個把牠們絕對的明確的界線劃分出來。從前惠施說：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宇宙所謂多，實不過『大一』與『小一』的區別，但小一是要在大一中才有其存在，離大一的小一，那是不可想像的，一花一鳥一人的小一，都祇有依於大一才能存在。將一枝花從樹上摘下，那花便衰萎而死，一隻離羣的鳥，固然可以生活，但牠在幼雛時仍然要依牠的母鳥才能長成。至於人，世界上便沒有孤立的人，所謂人實即社會的人

。小我祇有在大我中才能存在，如果將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信爲是四萬萬五千萬獨立的小一，那就錯了。四萬萬五千萬個，實在祇有一個。民族大我的一，包含個人的小我小一，這是 中山先生的基本思想。每一個細胞，是一個小一，一個生元。合着千小的細胞成爲一個動物的人，便成爲一個大一，一個大的生元了。推而上之，九大行星，並不是九個小一，牠們的存在是屬於這個大一的太陽系中，才有其意義。所以整個宇宙內的小一，都是有機體，矛盾却是變態病態，而非常態。

第二，有機體統一是不可分割的，對立的統一便是可分可合。我們知道宇宙就是整全的一個有機體。有機與無機之分，實則不過是宇宙進化的歷程的兩個階段，現在的科學仍然找不出牠們絕對不同的界限來。一花一草，我們可以將牠的花瓣花蕊以及根莖分割開來，但分割後如再接合，她已經是一死物，沒有生命。對立物的統一是可分可合的，牠是一種物理化學的統一，把一輛自行車的輪子橡皮，螺釘，彈簧，鋼絲，一一拆下來，如果你技術優良，當然裝置起來，仍是一輛自行車，可與行動，水分解出來爲氫與

氧，但氫氧化合仍爲水。可見對立的統一是數學，有機的統一超越於數學了，因爲是從一到一。宇宙祇是一，祇有一，所謂多，祇是人類的數學的認識。

三民主義是三個主義呢？抑是一個主義呢？牠是對立的統一呢？抑是有機的統一呢？我們的答案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1+1+1=3$$

這個算式祇是算數的，但我們的有機的統一，則以爲三個「一」的總和仍然是「一」。一件事物有體必有用，有關係者必有其關係。數學家祇看見關係者（體）而遺漏了關係（用），故三個一的統和是「三」。我們把關係者間之關係相連貫的來看，那就等於各個團結加上了各條網線，結果便打成一片，三個「一」的和，如果我們把加號（+）也一併算上，那也就打成一片了。假若一定要說是「三」，我們仍將「三」意味着祇有一個「三」的。老子最了解這個有機的統一。他說：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這個「則」字，就是代表關係。因爲曲與

全，枉與直，原來就不能分割。在客觀上，曲就是全，枉就是直，窪就是盈，敝就是新。我們行船在海面，近船的水面，看去是平面，其實這平面就是較小的球面罷了。所以直線是較短的曲線，「凹」字是向內的「凸」字，敝衣是較舊的新衣，精神是物質之用，物質是精神之體，中山先生以為二者不能分割，「二者本合為一」。〇

把握着這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統一，於是對於中華民族就必然認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既不是若干階級的相加，也不是若干民族的相連，而是本合為一的一個民族。所以我們的戰線不是各階級拚命的戰線，而原來就是警惕的民族障設。

第三，有機的統一是集集中的有創造的統一，對立的統一，是平行並列的聯合，或者相互滲透的混合，或者是無機的化合，總而言之，他不是「合一」。宇宙是一有機的整體，從自然科學中知道宇宙萬物都是有一個中心核的，萬物逐級圍繞其中心核而活動，大而言之，衛星之繞行星，行星之繞太陽，太陽系之繞宇宙的中心軸。小而言之，原子核的周圍便有若干飛動的電子圍繞着。人類社會的組織，雖有聯合體的組織，可視為對

立的統一，但聯體的組織是低級的，祇有集中體的組織才是高級的。在戰爭時期，聯體更不切於實用。共產黨的民族統一戰線，他們的統一，祇意味着各黨派的平行合作，各階級與各民族的聯合，完全沒有中心，有機的統一的民族革命是有中心的，他是擁護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一個政黨而活動。

由於以上的分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所以仍是國際主義的觀點，不是民族主義之立場，已可證明了。

八、結論

現在，讓我們來作一個結論：

一、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解決問題差異的焦點是民族至上主義。前者主張由民族主義包圍國際主義，後者是以國際主義來利用民族主義。

二、中國的民族革命，係中山先生將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主張進

行，便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三、被壓迫民族革命與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雖是世界革命的雙翼，但弱小民族革命却是主流，無產階級革命祇是弱小民族革命總問題之部份，部份危害總體，我們就要保全總體。

四、我們保護祖國，是爲了全民族的獨立解放，不啻是爲民族的某一階級的解放，同時也不是爲某一階級開闢出路。

五、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與俄國的民族問題，性質不同。蘇聯的戰爭是內戰，中國是對外的戰爭。中國內的少數民族，沒有受過沙皇式的壓迫，其分立權的要求，多由外力的引誘不是自發，蔣蘇聯的民族政策，生硬的移植中國，必收相反的結果。

六、中華民族，本來是一個民族，濃滿遼闊疆苗，都由上古同一民族分出的六大支族。氏族却不是民族，卽爲人易於認爲兩個民族的漢苗，仍本是同源而且現已同化。

七、中山先生以爲恢復民族自信力要恢復民族固有道德，但所恢復的民族固有

德是道德的本質。雖然道德的形式有前後的波動變遷，但道德的本質却相對不變。舊瓶新酒論的道德，是對中山先生道德觀的一種曲解。

八、共產黨高舉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理論與實然相悖，實則真正肩負抗日與統一的黨是國民黨。即在理論上兩者亦截然不同。一是馬列辯證法的對立的統一，是從中山先生理則思想演繹而來的有機的統一。民族的統一，不是綜合，聯合，混合，化合而是『合一』。因其黨的理論基於唯物哲學，國民黨的理論却基於民生哲學。

所以我們的結語是：

『中國要通過民族主義才能達到國際主義。中國的青年們！回過頭來，相信自己』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八四

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每冊實價銀五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著者 張 鑣 君

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

總社：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分支社：全國各縣及南洋各地

封 底